

回忆中的永恒

下

〔捷〕古斯塔·伏契科娃 著

谷中泉 何渝生 译
赵秋长 赵抱力

河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良元

封面设计：庄珠娣

回忆中的永恒

下

〔捷〕古斯塔·伏契科娃 著

谷中泉 何谕生

赵秋长 赵抱力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9.75印张 243,000字 印数：1—3,8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154 定价：1.90元

ISBN7-202-00041-5/K·10



目 录

第一章 霍坚麦尔日村·····	(1)
德国法西斯分子占领布拉格·····	(1)
我们是怎样生活的·····	(7)
霍坚麦尔日村·····	(11)
非常时期的日常生活·····	(19)
多马日利策。追寻鲍日娜·聂姆曹娃的踪迹·····	(20)
《 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 》·····	(23)
游逛旧书店·····	(28)
发现并翻译沙宾纳的著作·····	(30)
盖世太保发现了踪迹·····	(36)
最后一次回霍坚麦尔日村·····	(42)
第二章 地下斗争·····	(50)
转入地下·····	(50)
陷阱落空了·····	(57)
在布拉格见到尤列克·····	(64)
评沙宾纳的变节行为。反对叛徒·····	(71)
尤列克住在庞克拉茨区·····	(75)
《 蜂群 》杂志与《 环球评论 》刊史·····	(83)

伏契克——地下的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	(97)
我们从德军司令部为《红色权利报》探取情报·····	(107)
在被占领的黑暗日子里庆祝伟大的节日·····	(114)
雨后春笋般的红色报刊·····	(117)
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123)
第三章 在狱中 ·····	(133)
被捕·····	(133)
在庞克拉茨监狱。特别戒严·····	(152)
盖世太保巢穴中的反法西斯前哨·····	(180)
“四〇〇号”的终结·····	(207)
在查理广场监狱·····	(214)
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221)
“腊文斯勃鲁克”·····	(228)
红十字会大屠杀无动于衷·····	(248)
红军带来了自由·····	(257)
《绞刑架下的报告》·····	(268)
见证·····	(279)
生活属于人类！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302)



霍坚麦尔日村

德国法西斯分子占领布拉格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清晨，我们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即将开进布拉格这一情况竟一无所知。但到中午时分，尤拉带回一条新闻，说斯洛伐克已宣告为独立国。我的朋友古斯塔夫·巴列什连午饭也没有吃就出去了。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家。尤列克吃罢午饭再次外出。在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他也在家呆不住了。我们约定在艺术家俱乐部见面。

这天上午，捷克总统加哈乘车赶往柏林去谒见希特勒。在街头巷尾、机关、企业和咖啡厅，到处群情激愤，议论纷纷。自一九三八年秋天以来，我们的国家已被宰割得七零八落，希特勒占领了我们的原料产地和大部分工业区。昔日的“盟友”——英国和法国甚至不保障我国剩余领土的完整。德国的无线电台和报纸掀起了一场肆无忌惮的运动，把矛头直指慕尼黑协定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当时被迫在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加上一个连字符号）。毋庸置疑，不管第二共和国政府如何阿谀奉承，希特勒必将采取手段侵占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问题仅是占领的时间和方式而已。人们在谈论将被占领的新“地区”——是布尔诺、

奥斯特腊发，还是布杰伊奥韦采？总之，从斯洛伐克开了刀，我们是否也将遭此厄运？

傍晚时刻，我和尤列克一起到位于维诺格拉德区的苏联大使馆去。这是一座豪华的郊外别墅。纪念塔拉斯·舍甫琴柯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的晚会就在这里举行。与会者中有伊万·谢卡尼纳。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他自由自在生活的时间已经只有十二小时了。到会的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我们在这次晚会上同许多人的相见竟成了最后的永别。

在大使馆门前，有一些警察和便衣在值勤。他们紧盯着那些进入大使馆的人。

舍甫琴柯的那些浩气长存的歌颂自由的诗篇已经朗诵完毕，大钢琴的悠扬的乐曲也沉寂了，客人们纷纷离去。但是，共产党员留了下来。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回家的事。伊万和尤列克一刻不停地打电话，询问邮政总局和捷通社的消息，因为他们有许多认识的好友在那里工作。晚上他们才得知，在奥斯特腊发，捷克人与德国法西斯士兵发生了巷战。

我们祖国和人民面临着可怕的威胁。但是同志们仍镇定自若，有时甚至还能听到俏皮的玩笑和吃吃的笑声……

三月十五日凌晨四点左右，我们走出大使馆，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尤列克一路上陷入沉思，默默地抽着烟。他只谈了一点想法，即在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我们就应该不顾政府的屈膝投降而进行自卫。可现在进行斗争要艰苦多了。

大街上笼罩着黎明前的寂静。布拉格人还蒙在鼓里，大祸即将临头……

在家里，尤列克照例打开了收音机。我想，什么也收听不到，因为我们的电台从不这样早就开始播音，布拉格的广播要到六点才有。然而指示灯刚一亮，我们就听见了呼号——斯美塔纳的“上城”的主旋律。

尤列克招呼我过去：无线电台在这个不寻常的时间广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非常事件。我们站在收音机旁，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播音员终于开始讲话了。他用不自然的声调读着一份公报，说早晨六点钟帝国军队越过国境，开始侵占我国领土。政府号召居民不要反抗，因为任何反抗都会立即遭到德国武装力量的彻底摧毁。德国军队将于上午九时左右进入布拉格。

之后，是一片死一般的沉寂。我们的血液停止流动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布拉格将在法西斯士兵的铁蹄下横遭蹂躏。

尤列克站着，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他默不作声。我绝望地看着他那张呆滞的脸。不，他不能指望在政府不战而退，甘愿将我国大片领土让给希特勒之后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亡国的前景简直是不堪设想……

我抑制住激动，对他说：

“尤列克，你不能呆在家里。盖世太保一定会首先抓共产党人。你要知道，在希特勒执政之后，德国就是这样干的。”

尤拉沉默不语。他迈着缓步，在房内踱来踱去，用温存的目光扫视着书架上那一排排心爱的书籍……

“你不能留在家里。”我又重复了一遍。

他回答说，要好好想一想，往哪儿去避避风。到党员同志们那儿去是不行的，因为他们同样有被捕的危险。应该到同情我们但又不易引起怀疑的人那儿去。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他说，上演员拉迪斯拉夫·博加奇家去。

但是他迟迟不愿离去，一股劲儿地说，我国人民不会容忍被占领的状态存在下去，党将继续斗争，而且这场斗争将是空前的艰巨和残酷的。

我们商定，次日由我去博加奇家看望他。如果我不去，那就是说，家里的情况不妙。

现在就剩下我自个儿了。房间不知怎的顿时变得昏暗起来。

书架上的书籍仿佛也黯然失色了。那张摊着杂志、字典和书籍的写字台，当尤列克在的时候，虽然堆得满满当当却显得井井有条，如今他不在了，竟酷似被田鼠掘乱了的田野。窗外天气阴沉，浓云密布，湿辘辘的鹅毛大雪，漫天飞舞……

不久，我也走出家门。我需要哪怕在人们中间呆一小会儿。德国占领者正骑着摩托车进入布拉格，他们缓缓地行进着，好象在举行阅兵式。而街上的行人若无其事，就象没有看见他们一样……

我转回家来，开始清理尤列克的手稿。他的手稿不多，因为他很少将稿件从编辑部带回家。我把手稿装进一只筐子里，并在几天之后又将筐子运往比尔森。在尤列克的父母家，我和莉布莎把筐子藏到地下室的一个煤堆下面。这只筐子在那里一直藏到战争结束。

但这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三月十六日早晨，我去博加奇家。我小心翼翼地在沉静的街道上走着，不时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人在跟踪。

这两天，尤列克躲在博加奇家，但对城里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例如，在瓦茨拉夫广场，捷克人用拳头威胁德国士兵，大声抗议，而捷克警察对此只是袖手旁观，置若罔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镇压这些爱国者。根据种种事实，尤拉断定，人们多么痛恨占领者，简直恨得咬牙切齿。

在尤利乌斯一人独处的时刻，他总在考虑，要把我国人民的全部悲剧描写出来，使将来在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在人类不再遭受战火威胁的时候，知道并理解我们的斗争事迹：我们面对当时出现的局势没有采取妥协的态度，我们之中最有觉悟的人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战斗。尤利乌斯在我国人民极其艰难的最后时刻所感受和思考的一切，在他《致彼得的信》中，犹如汹涌的洪流从他的心底倾泻出来。《致彼得的信》是他为自

己的著作《彼得前的一代》撰写的前言。这本书他原想写成一部自传体小说，但只开了个头。当尤利乌斯向我朗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激动不已，它仿佛是一篇自白。

“彼得，彼得里切克，我头两夜不曾合眼，一方面由于工作，一方面由于焦虑过度而失去自制，第三夜不能入眠则因忧心忡忡。我是在为你担忧。我一闭上眼，就浮想联翩：你怎样出生，怎样长大，怎样成为一个男子汉……一次，你提出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一定会提出来的。每当我想到你可能不理解我，就惶惶不安，辗转反侧。是的，我知道，那折磨你许多年的问题，在某个时候定会冲破你对我们的尊敬和友谊的束缚，到那时你将会问：那时候是怎样的？那种事是怎么造成的？看来，这是遥远的往事了，你会说，要知道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就生活在那个年代……当时的欧洲，奴役与残杀行为猖獗一时。正义遭到空前的践踏，那些被迫屈服的人所咽下的每一块面包，可以设想，都是苦涩的。他们怎么能忍受这般虐待？他们作了些什么事情来反抗这种非人的待遇？这些人是多么令人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不是人的血液？支配着他们大脑的是不是人的神经？在他们胸腔内搏动着的是不是人的心？总之，他们还是不是人？

可能，我的孩子，我将永远见不到你了……

我们，是撒在土地上的种子，彼得，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我们这样称呼自己。当春天降临的时候，并非我们全都能脱颖而出，茁壮成长。任何一只踩在我们头上的“铁蹄”，都可能对我们的攻击和践踏。我们横死于铁蹄之下，是由于偶然，还是由于仇视或者戏谑——而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

然而，彼得，你不要以为，我们害怕这个。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茁壮成长，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死于非命。我们知道这一

点，我们为此而活着。长出的穗儿将覆盖坟墓，而人们会忘却他们，忘却一切——无论是恐惧，还是屈辱——只有庄稼能向你们青年一代讲述我们（包括活着的和已经死去的人）的事迹，收获庄稼吧！用它来滋养自己吧！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为此而活着……

我把自己的信好象装在一只瓶子里，投入了时代的海洋。让幸福的激浪把它冲到你的脚下，请擦去我们遗书上的霉斑，读一读那些遥远的故事吧，看一看我们是怎样的人，为的是你能理解我们，我亲爱的、陌生的孩子，我的彼得！”

我们的邻居、建筑师戈内让尤列克到他家去住。我们两家各自的小贮藏室与一公用阳台相连。尤拉走到阳台上（我们住在楼房的最高层，从下面谁也不能发现他），把头伸进小贮藏室窗口，用口哨轻声吹着革命歌曲《千万只手在黑暗中举起来》的头几拍。这是我们的暗号。我应声而出，于是我们开始低声交谈。他，站在小阳台上，我，站在贮藏室里。他开玩笑说，我们好似一对情侣，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通过小窗口我递给他食物、报纸和我们自己的藏书。在被占领的最初日子和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尤拉读了许多书，尤其是维克多·德克和扬·聂鲁达的诗篇，从中吸取了力量。很难描绘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我们的不战而降使他多么痛苦。然而，我不能说，我在什么时候曾见他有绝望、屈服和妥协的情绪。

在占领者到来之后不久，共产党以笔名“出版者莉布莎·特尔涅奇科娃”出版的唯一合法杂志《光辉的典范》周刊继续发行了。尤列克早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就是这份杂志的撰稿人。在纳粹分子的眼皮底下（尤利乌斯的手稿由我送往编辑部）他发表了下列文章：《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和平与诗人》、《从捷

克文学中学习什么》、《论弗·拉·切拉科夫斯基》^①、《扬·阿莫斯·科门斯基与和平》^②、以及《论奥托卡尔·布尔热齐纳》^③。所有这些文章他都没有署名。

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第十五期《光辉的典范》是最后一期。法西斯分子查禁了这家杂志……

我们是怎样生活的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们常到艺术家俱乐部去，因为尤拉是它的成员。经常出入那里的有演员、艺术家、作家、雕塑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士，而纳粹分子却误认为这是一群“腐化堕落分子”。俱乐部主任是林加尔特同志。在俱乐部里大家热烈地探讨着有关进步文学和艺术的问题，但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我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及其展望。光顾俱乐部的这些常客，谁也不相信德国能长期占领捷克。

俱乐部的成员远不都是共产主义者，但对占领者的强烈仇恨把大家联结在一起。在从事艺术活动中的人中，有些人与保护国政府的官员有来往，他们经常将可靠的情报、甚至秘密材料提供给付契克。在尤利乌斯口授下，我用打字机将这些消息打下来，然后分发给已经转入地下、但与伏契克仍保持着经常联系的同志们。这种情况持续到一九四〇年夏天，他自己也被迫转入地下为止。

一九三九年我和尤拉相继失业，经济遂告拮据。嗣后，艺术

-
- ① 弗兰季谢克·拉迪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1799—1852），捷克诗人和民俗学家。——译者注
- ② 扬·阿·科门斯基（1592—1670），捷克人道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教育学经典作家。——译者注
- ③ 奥托卡尔·布尔热齐纳（1868—1929），捷克诗人和哲学家。——译者注

家协会开始给我们发补助费——每月六百克朗。这区区款项仅够我们支付房租。还在年初尤列克（自然还是用笔名）便在下列杂志上发表文章：《清》、《新自由》、《我们的采斯塔》、《昨天》和《光辉的典范》，但不久这些刊物都先后遭到查封。现在只剩下了一份不固定的收入：为“中国人”出版社撰稿所得的稿费。我们开玩笑地管它叫“清”^①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经理是普尔希克雷尔，在他被捕之后，塞德拉切克把该社的书评工作交给了尤列克。这是一些半评论半广告性的小文章，篇幅只有二、三页。每篇“小广告”（尤列克这样称呼它）他能得五十至一百克朗稿费……

一次，在电车站，我们碰上了约瑟夫·加沙，并邀请他来我家作客，因为他想对尤拉谈一谈有关麦兰特里赫出版社的事。加沙于星期日中午来到我家。谈话间，约瑟夫好象顺便地问道：

“你们怎么的，今天没做午饭？”

“是的。”我回答。

“你们要去饭店吃？”客人关切地问。

“可能。”我说。

加沙不再问下去，而尤列克也转了话题。我们当时的境况就是这样困难，我们没有食物可充饥了。

傍晚，我们在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了三十张已付款的午餐券，是瓦茨拉夫广场瓦沙塔饭店的。除了加沙，没有别人会把它们送来。尤列克拿起餐券，默然地注视了片刻，然后说：

“我们可不能全留给自己。别的同志同样也没有吃的。我们把它分了，好不好？”

于是，他给了扬·克雷奇和弗里采克·赖钦各十张餐券。

① 文字游戏。“清”（ЧИН）按捷克语即是“中国”（КИТ）

——作者注

一九三九年五月初，尤列克被唤到艺术家协会，并得到通知，要他去国家职工工会中央。这是一个与德国法西斯分子合作的机构，当问到“去干什么”时，有关人员回答伏契克说，国家职工工会中央要失业的新闻记者名单，看来是想起用他们。尤列克当即乘车回家，想仔细考虑一下，该不该去。我们商量的结果是，他先去打听一下，他们想要他做什么。

尤列克会见了国家职工工会中央主席斯托切斯。他似乎根据和帝国保护人沃尔弗勒姆·冯·沃尔默（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通戈兰·冯·奥斯拉”，因为他的名字使我们联想起一个灯泡商行）所辖的出版局的一名政治专员达成的协议，建议伏契克担任《捷克工人》杂志文艺栏的编辑。他们打算在帝国为捷克工人出版这份杂志。

应该说，在特别崇尚浪漫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时代，谨慎小心是尤拉习与性成的一种品质。现在这种品质对于尤拉大有裨益。尤利乌斯断定《捷克工人》将成为法西斯的喉舌，所以他不能接受这个建议。但是，表面上他没有加以拒绝，而是请求给他几天时间考虑。难道斯托切斯，这个十分清楚伏契克是共产党员的家伙真的认为，伏契克会在几天的时间里改变自己的观点吗？

尤利乌斯有可能在法西斯刊物上发表反对占领者的文章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他一这样做，就会立即身陷囹圄，而文章反正是不会让发表的。令我们踌躇的是，一旦他去国家职工工会中央回绝要他担任的职务，他们是否会当场就逮捕他。去，还是不去？尤利乌斯到底去了。他没有一下子就表示拒绝。开始他问，给他多少薪金，他们回答说：要划出整整一版作文艺栏，文艺栏的编辑费加上每篇文章应付给作者的稿费，每月可给他一千克朗。这些钱伏契克嫌太少了。他们又提出给他一千五。这个数目他也嫌少。于是他们把钱数提到两千，但此数他仍不满足。最后，当酬金提高三倍，以至尤列克感到继续玩这个讨价还价的游

戏太危险时，便说道：“无论你们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出卖自己的信仰。写你们想出的东西，我办不到；而我想写的，你们又永远不会让出。”

之后，他就到了记者协会，把自己拒绝去《捷克工人》杂志社工作的事告诉了同事们，一些同事吓破了胆——尤列克莫非发疯了，他很快就会被捕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这件事本身就可构成逮捕的理由。但尤列克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

一九三九年五月，尤列克在库尔特·康拉德（苏联驻布拉格领事馆的新闻专员）的帮助下，送了一篇文章给莫斯科电台。这篇文章的副本没有保存下来。在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伏契卡·瓦西里·普罗库佩克同志从莫斯科将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带给了我：

“犹如昔日的五月，彼得希纳的丁香盛开。犹如昔日的五月，列特纳和金斯基花园草坪的斜坡上，一群鹁鸟在嬉戏游憩。犹如昔日的五月，鸭群在春雨潇潇的伏尔塔瓦河畔，孵出雏鸭。而布拉格，她在明媚阳光的普照下，也显得格外美丽。但永远以自己城市而自豪的布拉格人，今天却不因她的美感到快乐，令布拉格人愕然的是树木的麻木不仁，它们在一九三九年的五月竟也想绽开嫩芽，披上绿装。”

是年四月，党中央派了一个同志来看望我们，建议尤列克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当时，一批同志已经顺利地撤离——秘密地、没有护照或者带着假护照取道波兰，转赴苏联或美国。然而，尤列克却回答说，捷克斯洛伐克也需要党的职业革命家来组织反抗占领者的斗争。不过，他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

五月中旬，这位同志第二次来时，带来了护照、路费，并一字不差地转达了下面的话：“尤拉，党认为你应该走，如果你同意的话。”尤列克答道：他是这样理解这番话的，即党让他自己作出选择。可见这不是党的命令，因此他决定留下来。我劝他

他很倔强，走，也是枉然。于是，关于他的出国问题最后就这样了结了。

那位同志走了，过了一小时尤列克也走了。他刚走不一会儿就传来了门铃声。这不是乞丐上门求乞的那种胆怯的铃声；也不是友人报告自己来访的那种快活的铃声。这铃声刺耳地响个不停，象是在下命令似的。我怀着惶惑的心情打开了门。只见进来两个人，向我自我介绍说：“盖世太保！”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捷克人，翻译官。他们问我姓甚么。我说了门牌上写的那个姓。原来他们想弄清的是，巴列什是否住在这里。我顿时如释重负，平静地回答说，巴列什一家早已离去。什么时候？我想了一下说：今年年初。其实不是这样，巴列什同志是三月十四日离开这个寓所的，他走后不久，他的妻子也走了。她有时甚至还上我们家来串门。我对盖世太保声称，似乎很生巴列什夫妇的气，他们走时既没有付房租，也没有打招呼。

我遵循着一条原则，说话是银，沉默是金。所以对他们接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我都回答得很简洁。这两个盖世太保还不象我后来遇到的一些那样凶恶，他们命令我说，一见到巴列什或他的妻子露面就立即去报告，说罢便走出房门。

盖世太保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消失之后，我从戈内家给巴列索娃的兄弟打了一个电话，要他转告巴列索娃：请她晚上务必去艺术家俱乐部一趟，我有要事相商。巴列索娃的兄弟请准假后，急忙去找姐姐，因此在当天我就顺利地将情况通知了他们。

霍坚麦尔日村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决定，在德国法西斯分子入侵我国后，不是所有的职业革命家都应立即转入地下。因为地下状态，意味着要有秘密住处，要用化名，还要中断和过去熟人的一

切联系。在与占领者进行的艰苦斗争中，党一刻不忘积蓄力量，部署队伍。因此，尤列克没有被派往火线。尽管他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地下中央保持着秘密联系，但他的身份还是半合法的，他必须做到不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

尤利乌斯拒绝和法西斯刊物合作，盖世太保造访我们布拉格的寓所，这是我们决定前往霍坚麦尔日的原因。除此而外，还有一个情况也促使我们采取这一步骤。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官方公报公布了布拉格地区刑事法庭就伏契克一九三八年夏天写的一本小册子《红军会援助我们吗？》所作的判决：“根据法律和法令汇编50/23号法律第二条第十八款，该书纯属造谣，特勒令没收，并严禁扩散。”过了一些时候，六月十五日，在官方公报上又登载了上述法庭没收伏契克另一本书《在我们的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的判决。

于是，我们乘火车到了霍坚麦尔日。伏契克家的房子是一幢二层楼房，每层有四个房间。底层附有两个简陋的房间，楼层带着一个晾台和一间小房，主人给这间小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前厅”。晾台面朝南。前厅东墙开了四个窗户。在窗户之间的墙壁上，一台饰有布谷鸟的老钟在滴嗒滴嗒地响。靠近北墙摆着一架钢琴。尤列克的妹妹们常在那里弹琴。在前厅中央放着一张又大又沉、带有一只大抽屉的桌子。它是父亲的所有物。桌上摆满了钉子、小螺丝钉、凿子、小斧头、钳子、锉刀、钓鱼杆和漂子，另外还有一个笔记本。父亲在笔记本里井井有条地记着：菜园里收获量有多少；洋白菜、莴苣、球茎甘蓝栽了多少；母鸡每天下多少蛋；给鸡买了多少玉米饲料；孵蛋的母鸡什么时候孵的蛋；母山羊利津卡将在什么时候产小羊羔等等。父亲的抽屉谁也不敢去动。这间前厅成了我和尤拉的办公室。夏天，每逢星期日我们必须把桌子腾出来，以备进午餐用。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参加星期日午餐的有时多达十人。他们是父亲和母亲，尤拉和我，尤拉的两

个妹妹——莉芭和维拉，莉芭的丈夫，他们的两个小女儿，以及维拉的未婚夫。

从伏契克家买下这所房子的时候起，父亲就开始领取养老金，整年生活在霍坚麦尔日。自然，他时常到比尔森去，因为妈妈和维拉住在那里（维拉当时还在上中学，后来她就到比尔森郊外的一个村庄教书）。但是，这位老人还没有在那里热和上一阵，便又急急忙忙赶回霍坚麦尔日。只是在圣诞节，他才在比尔森逗留数日。妈妈和维拉从早春开始直至深秋（夏天的两个月除外），每逢星期六也上父亲这儿来，星期一返回比尔森。盛夏时节，伏契克全家都到霍坚麦尔日来，济济一堂，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妈妈看到所有的孩子都在跟前，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尤列克的到来，对她来说如同过节一样高兴。他很少回家，而妈妈又是那样地疼爱他！

我们是在五月末动身去霍坚麦尔日的。占领时期，从比尔森开往多马日利策的所有列车的车厢都分为三等。在三节头等车厢上（头等车厢紧挨着火车头，因而冬季它们要比其它车厢暖和些）挂着写有“帝国—帝国”的牌子。头等车厢专供德国人乘坐。在本国旅行的捷克人，禁止入内。在头等车厢后面的四节车厢上，写着“保护国—帝国，帝国—保护国”的字样。捷克人只准乘坐最后一节车厢，上面写着“保护国—保护国”。德国占领者认为，一列火车划出一节车厢给被奴役的捷克人使用就够了，再说这节车厢还几乎没有供暖设备。由多马日利策及其郊区至比尔森，每天有许多工人往返其间，一节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而其余的车厢却经常是半空着。从比尔森开出后的第二站尼尔让纳，以及随后的五个站：兹布赫、霍捷肖夫、斯托德、斯托德附近的格拉杰茨和戈列肖夫，连同它们郊区的矿场和工业企业，自一九三八年秋天起统统被并入帝国的版图。当火车通过这片“日尔曼的”领土时，捷克人不准打开车窗；他们只能透过玻璃看一看沦丧的国土。你